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

Modern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Language Movement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刘进才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

Modern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Language Movement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刘进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 / 刘进才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301-26256-6

I . ①语… II . ①刘… III .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 ① H1 ②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9097 号

书 名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
著作责任者	刘进才 著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5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 pup@ 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355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470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知难而进 自我超越(代序)

——读刘进才《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刘增杰

—

刘进才 2007 年出版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①(以下简称《语言运动》)是一部系统地把语言运动、现代文学与国文教学纳入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化整体加以考察的学术著作。著作在出版前后,受到了专家的支持与好评。刘进才的合作导师杨义在该书刚刚脱稿后说,这部著作打破了之前现代文学语言研究中“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语文教学三者分割的研究局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与文学生产的整体观”。解志熙在《序》中也说,刘进才选择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课题作为自己博士后 的研究课题,不是自以为在这方面有什么过人的积累和优势,倒恰恰因为它对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足以促使自己早日走出博士论文的“成功”,尽快地超越既有的学术“自我”。解氏感慨地说:“像进才这样不但不自满反而主动向自己挑战的人,委实不多。”我与进才相交已经二十多年,对解志熙所做的评价也深有同感。

“主动向自己挑战”,也许是刘进才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理念。2002 年 6 月博士论文通过后,他立即开始关注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六年之后,《语言运动》出版后,他又开始对《语言运动》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学问‘扬长避短’固然很重要,但更应该‘扬长补短’! 所谓‘短’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克服的,但一味地‘避’总不是办法。我虽然做不到梁启超先生所谓的‘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又过了六年,他的新作《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的打印稿又放到了我的书桌上。作者在《语言运动·后记》中有过这样的自我省察:“我在具体文本分析方面似乎还有点基础,但史料方面的研究显然薄弱。”《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通过对自己开掘的大量史料的贴切阐释,填补了目前国语运动研

^①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究的不足,也弥补了自己史料“薄弱”的缺憾。

我忆起了与进才交往中的一些琐事。作者是个有心人。一些年来,他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有着近乎痴迷的嗜好。《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绪论谈到自己使用的历史文献时,他在如实地介绍使用大成老旧期刊数据库、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情况后,只轻描淡写地作了这样的交待:自己使用的史料还有“之前曾经复制拍摄的民国旧籍及报刊”。这半句话,既有着作者含而不露的谦恭,也容纳了他长期奔波、殚精竭虑地寻觅史料的难忘记忆。据我所知,不论在广州或北京读书期间,还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短暂日子里,他总是牺牲休息时间,饶有兴致地跑图书馆,逛旧书店。他是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常客。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次从外地开会回来,他曾经向我叙说过在会议之外意外打捞到一批史料的收获。我还知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习结束返校的时候,他带回学校的,几乎竟全是装满大箱小箱沉甸甸的旧籍、报刊的复印件。日积月累的史料功夫,使他的著作在史料的占有方面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一书所涉他读过的《国语周刊》《国语旬刊》《国语月刊》《国语通讯》《国语报》等相关刊物、报纸副刊有五十余种,相关论著多达一百二十余种。因为拥有较为完备的史料,作者的这部书写起来顺手,底气很足。

二

我不善于进行比较研究,不在这里具体讨论两部著作的短长。总的印象是,《语言运动》和《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的结构设置虽然都是三编,也是进行“国语运动”“现代文学”“国语教学”的关联性研究,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也有所交叉。表面看来,似乎《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只是《语言运动》的增补。但仔细阅读书稿后发现:两部著作的内容与角度并不相同。《语言运动》着重研究的是现代语言思潮,以理论言说见长。《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则是在《语言运动》的大格局下,对国语运动的具体评说,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言,是对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再探索。《语言运动》与《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与学术生命。当然,两部著作也带有共生互补的学术特征。人们也不妨把它们看作系统构思的姊妹篇,把《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解读为《语言运动》富有意味儿的扩展与深化。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写得扎实。该书上编,作者以自己发掘的大量第一手的史料为基础,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国语运动发生、发展的曲折历

程。作者围绕国语标准音的确立问题,详尽地考察了切音运动、《国音字典》的编纂与重修、《国音常用词汇》的出版以及定京音为标准音问题。对于“京音”与“国音”之争,作者的研究视野开阔。指出:“对‘京音’的质疑,实质上是对普遍均质的语言共同体如何可能的质询”。此外,有关国语运动阵地《国语周刊》的创立、全国语言运动大会的举行,现代语法著作的出版等,作者都以崭新的内容,疾徐有致的笔调,作了系统的梳理,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国语运动发展绚丽多姿的景象,在国语运动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中编,从国文教学的视角,集中地考察了课堂口语教学、国语演讲竞赛、诵读教学、作文教学等在实践中取得的进展。在作者看来,国语运动既需要国语家在书斋斗室内精心细致地做大量研究性工作,也需要落实到中小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同时,国语教学一方面连接着国语运动,一方面连着现代文学。国语教学是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作者的这一认识,既融入了他个人青年时期从事语文教学的切身体验,也是对“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创见的总结。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不久,当时有人就从推广白话的视野,从中小学国语教学的角度,在文言与白话的比较中,指出了《呐喊》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修辞方面,我觉得在近今语体文中,又特出一格,语体文长处是详细,但简明则不如文言,现在往往长到三四十字以上,太倾向欧化,使人读了,总发生不如文言简明了当之感。这确是语体文还未成熟的小小缺憾!该集中(指《呐喊》),首先使我们注意的,是句调的单纯与明显,不加一句方言,再没有一个废字,而且流利通快,又似含有自然的声韵。有这几方面的特长,怎能不会感动人,怎能不使人得到无限深刻的印象?”作者还认为,《呐喊》“至少也可以用作一部作文法与修辞学读,比较什么国文作法,实在高出十倍。因此:我觉得《呐喊》确是今日文艺界一部成功的绝好的作品。有左右文艺思潮倾向的魔力”。^①二十年代这位作者提出来的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应该进入课堂的见解值得重视。国文教学研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向这个方向开掘。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下编对现代文学语言论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语言论争中的是是非非的评论,有着要言不烦的述说,新见迭出,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研究的焦点,投射到了方言与国语、大众化和大众语论争、语文通俗化运动及民族形式讨论等论题上。无论从现代文学研究视角,还是从现代语言学研究角度,这个问题都值得进行系统的认真研讨。长期以来,虽然不时地能够看到研究者对其中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

^① 丫生:《读〈呐喊〉》,1923年10月16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4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但却缺乏整体的关照。进才从国语运动的全局对此开展研究，应该认为，这是跨出的很有意义的一步。

进才的《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研究告诉人们：学术研究从来不缺乏机会，缺乏的是认识机会的能力，缺乏的是把握机会的胆识。当前，国语运动的积极价值仍待进一步开掘，需要用国语运动与现实的接轨来激活研究对象。刘进才正是运用自己的优长（包括史料的准备，对问题长期的思考，乃至青年时代从事语文教学的经验等），直面国语运动复杂的经验世界，有意识地进行了多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梳理，不温不火的学理辨析，终于发现了气脉相通的国语运动的运行轨迹，呈现出了各种主张之间相斥相融、交错互动的原始景观，使自己的思考成为一种言之成理的言说系统。规律从来不是现象的直白宣示。国语运动的存在形态同样不会以井然有序的面目呈现于世人。作者在看似杂乱无序的现象中，发现了国语运动似断似连，似隐似显的精神过程。进才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赞许。

三

如前所述，学术追求永无止境。我在进才的《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后记中读到了作者这样的告白：“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我知道，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依然准备着……”。这几句颇带哲理意味的人生感喟，让我们愈发感受到：箭在弦上。作者渴望新的自我超越的勃勃雄心跃然纸上。

其实，关于国语运动、语言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之路都“还很漫长”，需要像进才这样的一批研究者继续献身。应该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基础性建设：如出版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现代国语运动史；还应该以集体之力，经过广泛搜集、整理，出版较为完备的中国现代国语运动史料汇编；出版现代国语运动研究家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包括蔡元培、胡适、叶圣陶、黎锦熙等人的评传或其他专题研究著作，等等。这样，一个立体的国语运动的全貌就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研究国语运动的后来者留下当下研究者的证词。

在国语运动史料汇编中，国语运动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需要耐心地进行辨析与清理。这一类的问题较多。比如，国语问题的讨论有时被纳入了政治学的运转轨道，讨论往往无果而终。有时，论辩者的特定政治身份，或已经形成的学术权威地位，也使讨论长期以来无法进一步展开。国语运动初期出现的主张白话，反对文言和坚持文言，反对白话者

的誓不两立问题,留下了许多极端化、绝对化的言说。如果把这些文化现象作为精神遗产进行深度反省,就会发现,这可能不仅仅只是语言问题,它很有可能会触及到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子。甚至,对百年来反复出现的某些极端化思潮的顽疾,有可能找到深层的历史因素,从而启示我们进行沉重的精神洗礼。

胡适、鲁迅当年的主张我们都耳熟能详。如胡适在《国语的进化》长文中说,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承认“应用文可用白话,‘美文’还应该用文言”。针对这一主张,胡适的结论是:“即此一端,便是古文报丧的讣闻,便是文言死刑判决书的主文”(《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1928年,胡适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一章的题目,竟是“古文是何时死的”这样非学术的武断。该书《引子》的评论同样也表现出了惊人的专横:“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的文学史”。文言与白话都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标志之一,一句“死”、“活”,哪能轻易宣判它们的死活!

鲁迅当时的主张也竟和胡适近似。1919年,鲁迅在《现在的屠杀者》中说,那些反对白话的人,他们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1926年,在《二十四孝图》一文开头,鲁迅宣布:“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还说“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为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鲁迅还申明:“只要对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凌厉的笔锋直刺论敌的要害,情绪之激烈偏执溢于言表。

胡适、鲁迅都是我们崇爱的新文学的开拓者。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坚定态度很有代表性,传递出了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者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生命律动,表达了他们在外侮不断,军阀内争不休,黑暗没有尽头时刻改变中国现实的决心。可以说,用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变革,正是他们在文化上找到的一个突破口。但是,当历史沉静下来之后,他们所坚守的白话与文言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方式,他们极端化的情感宣泄,就显得格外的刺眼和虚弱,他们的言说无法穿透时间的力量。现代国语运动的实践证明,白话和文言并非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白话在发展进程中对文言有着多方面的吸收与继承。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正是不断地在吸收古语、方言以及外来语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这一问题应该是今后开展语言变革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再如,进才在本书《后记》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探讨。他

6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说：“学界普遍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但是这些具体的影响怎样通过文学文本反映出来，翻译文学又怎样具体影响了哪些现代作家的文学语言？倘若通过具体文本个案或典型作家个案加以仔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就会落到实处。”这一较具学术难度的课题，期望进才或其他有兴趣的研究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奉献出具有独创性的答案。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应是一部动态性的研究著作。进才对《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的叙说自有其优长，但我们仍然鼓励对该问题研究的开放性与差异性。即使史料大致相同，采用不同的理论进行建构，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甚至对立的结论。研究民族语言，应有强烈的历史感，具有巨大的谅解的胸襟，这是研究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2014年4月30日于河南大学

21号家属院寓所

目 录

知难而进 自我超越(代序)

- 读刘进才《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 1

绪 论	1
一、“国语运动”“现代文学”“国语教学”的关联性	1
二、有关论题的研究现状	4
三、本论题研究内容及研究路径	9

上编 国语运动与国语标准的建立

第一章 语音的政治

——国语运动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	15
一、从切音字运动到《国音字典》编纂	15
二、京音与国音之争	21
三、从《国音字典》到《国音常用字汇》	31
四、标准语音的制定与国音字母的推行	35

第二章 “运动”的“逻辑”

——国语运动的展开与深入	40
一、口号的力量：“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感召力	40
二、《国语周刊》与国语阵地的开辟	47
三、制造“国语风”：全国国语运动大会的筹备与举行	54

第三章 国语辞典编纂与国语标准的探寻

一、“国语界的蛰伏”与国语辞典的编纂计划	63
二、国语辞典的出版与标准语汇的写定	71

第四章 国语语法探讨与现代语法的革新	77
一、新文学呼唤新的语法规范	77
二、国语语法编著与现代语法的诞生	86
三、国语语法的教学问题	96

中编 国语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第五章 从无声的文字到有声的国语

——国文教学与口语训练	103
一、“国语课程纲要”强调“口语训练”	103
二、课堂实践重视口语教学	111
三、国语教材采用“对话”素材	117

第六章 国语演讲竞赛与国语运动的普及

一、新文学家的演讲活动	126
二、课程纲要与演说练习	130
三、国文教材与演讲文体	133
四、国语演讲会与国语演讲比赛	136
五、中小学生的国语演讲文稿	142

第七章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一、古典诗文的诵读传统	149
二、白话文,应该如何诵读?	153
三、新诗诵读与白话语言的纯粹	163

第八章 作文教学与国语的文学

一、国语教学变革与白话文的合法化	171
二、新文学进入教材与白话文范初步确立	175
三、国文教材编纂与选文之争	183
四、作文教学与中小学生的作文文体	193

下编 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的语言论争

第九章 普遍性,还是地方性?

——“方言”“国语”的紧张与互补	211
------------------------	-----

一、晚清士人的国语和方言观	211
二、歌谣征集与方言的“发现”	216
三、《吴歌甲集》引发的方言文学讨论	223
四、方言的文学与候补的国语	232
 第十章 何谓“大众”，如何大众“语”？	
——大众语讨论中的文学语言问题	239
一、从平民到大众：“大众”话语的嬗变	239
二、白话文的危机与大众化的倡导	243
三、从大众化到大众语	249
四、大众语与国语问题	258
 第十一章 文章，应怎样“通俗”？	
——语文通俗化运动中的文体和语言问题	263
一、《语文》月刊的“通俗化运动”征文	263
二、《民众周报》的通俗化实践	277
三、老舍、老向的“抗战通俗文艺”制作	283
 第十二章 民间的，就是民族的？	
——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文体形式及语言问题	292
一、旧瓶，何以装新酒？	292
二、“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	297
三、民间语言的“再发现”	301
四、“五四”的语言遗产	308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0

绪 论

一、“国语运动”“现代文学”“国语教学”的关联性

国语运动主要是指晚清以降到 1949 年共和国成立之前进行的以“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为目的的汉民族共同语运动。“国语统一”要求无论是现代书面白话语言还是用来交际的口头语言都应该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言文一致”强调书面语言不用传统的文言，而用现代的口语，无论是文学语言还是其他应用文乃至述学文体都要求书面的“文”与口头的“言”尽量一致。国语运动是中国汉语书面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语言现代化运动，这是一场承接清末切音字运动，由民间推动、政府发起同时又面向民众的语言统一运动，国语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与推广，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晚清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挽救国家民族日益沉沦的命运，反对强权，救亡图存，开启民智，既是近现代文化的基本主题，也是近现代文化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19 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包括汉字改革和国语统一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方面。汉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逐步走向汉字拼音化，其间经历了废除汉字运动和汉字简化运动，国语统一的目标在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音为基本音，建立汉民族共同语。

国语运动在晚清已经开始，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清末一批有志于改良中国语言文字的趋新人士创制了拼切繁难汉字的各种拼音字谱，如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劳乃宣的《简字全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1902 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3 年，王照在北京创办“官话字母义塾”，并印行《拼音官话报》，宣传和教授其官话字母。其后，袁世凯属下的直隶学务处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官话字

母”，把它列入师范和小学课程，各地乘势而动，争相推广，迅速传遍多个省份。差不多与王照同时，劳乃宣对王照的“官话字母”发扬光大，先后编定“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1907年合成《简字全谱》在南京出版，并先后在各地创办“简字学堂”加以推广，使许多不识字的妇女村民通过短期学习，初步具备了看报和写信的能力。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1915年，在京会员王璞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附设“注音书报社”，刊行注音读物和《官话注音字母报》，1916年8月，北京教育界人士公推蔡元培为首，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供教育界之采用”为宗旨。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与此同时，《新青年》等刊物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掀起了用白话文写作的文学革命思潮。文学革命的突飞猛进也给教育界以极大的鼓舞，鼓吹国语统一、倡导言文一致成为教育界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国文教学改革问题相应地提到议事日程。1918年，蔡元培自信地宣布：“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①不久，当时的教育界行政要员张一麟专门撰文探讨国语教育和教科书的问题，他设想“若是将来做成一种教科书，推广到全国，那么我国一千个人中的九百九十三个不识字的半聋半瞎半哑半呆等同胞，仿佛添了一种利器，叫他把天生的五官本能完全发达，那不是一种最大的慈善事业么？”^②这一观点把国语运动与国文教育联系起来，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的成功实乃取决于白话教科书的大力推广。

1919年4月17日，作为教育部附设机关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中关于国语统一的各项议案中，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

^① 《国文之将来》（1919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90号，1919年11月19日。

^② 张一麟：《我之国语教育观》，《教育杂志》第11卷第7期，1919年。

刘复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值得关注，议案主张：

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一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①

于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教育部 1920 年 1 月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复等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健将，都是文学革命中人士，他们试图通过国文教学改革以巩固并传播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成果，而教育部则从国语统一的视角看重国文教学中的言文一致，朝野之间在国文教学上达成了共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合流。

二者的合流不但进一步凸显了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联，同时也使中国的语文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动。由原来教授“国文”到五四后的改授“国语”，在教育体制内部确立了新文学的合法性地位，使国语运动从“书斋里的学问”化作了面向大众的教学实践。新文学最初进入小学教材首先是出于国语教学实践的需要，语文教学连结了一向表面看来似乎“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的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为造就现代新型的国民——所谓新型，除现代性的思想理念外，还包括习得为获得现代理念所必需的现代语言习性，语文教育自然就首当其冲。事实上，许多语文教育家也往往身兼两职，或者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和研究家，或者是新文学作家，前者如黎锦熙、魏建功、吕叔湘等，后者如胡适、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他们通过编纂中小学语文教材，既贯穿了国语运动的理念同时也巩固了新文学的成果。中小学语文教学（共和国以前称之为国文教学或国语教学）是国语运动家和新文学作家共享合谋的合法性“实验基地”，也是趋新与守旧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争夺交汇的“文化场域”。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纂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领略到国语运动的理念如何通过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落实到国语教学实践活动中，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现代文学进入语文教材的合法性和经典化过程。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国语口语训练和作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既有效促进了国语运动提出的“国语统一”的目标，也加快了“国语的文学”的

^① 见《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19 年。

形成。

就建立汉民族现代标准语而言,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各自的实现路径不同而已。文字改革者和国语运动家通过编撰国语词典审定国音、收录新词、写定词汇,大大丰富并改变了原有的语汇,通过制订新的文法、语法体系规范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表达,最终实现统一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新文学作家则是通过胡适倡导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路径,借助新文学创作实践以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前者侧重语言标准的制定,后者更关注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

二、有关论题的研究现状

关于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相互关联的研究和思考,之前的研究者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开创性工作。胡适最早把文学与国语两个问题关联起来进行思考,他的文学革命的“十字宗旨”是其集中的表达。二十年代初,胡适在题为《国语运动与文学》的演讲中再一次申述:“我们能够使文学充分地发达”,“可以加增国语运动底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①此后,胡适在《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②中进一步把文学、教育乃至语言工具改革作整体的思考,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故事、小说等成为学习标准白话日用语言的教师,白话不但作为教育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造与产生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工具。三十年代,黎锦熙在其《国语运动史纲》中专列一章“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探讨了“国语统一”运动和“文学革命”两大潮流完全合作的历史过程。黎锦熙认为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在各自标榜的“言文一致”的口号中取得了共鸣和联合。除此之外,在各自运动的人的关系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既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长,其麾下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复、沈尹默、李大钊轮流编辑倡导文学革命的刊物《新青年》,这其间自然会发生声气应求的作用:于是两大潮流合而为一,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③。

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语运动逐渐被推广普通话运动所取代,“普通话”代替了“国语”,此后关于国语运动与文学的关联性研究逐渐减少。直到新世纪以来,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① 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

② 胡适:《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台北《征信新闻》,1961年1月11日,见《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③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1页。